

决策参考

Jue ce can kao

第 110 期 (总第 360 期)

盐城市图书馆编

2011 年 6 月 15 日

主编 刘进 责编 周玉奇

zhouyuqi@gmail.com 18961988622

编者按: 6 月 13 日, 第三届中国食品安全论坛暨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卫生部尹力副部长、工业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王黎明在会上先后发表了主题演讲。根据国家统一部署, 江苏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定于 6 月 13 日至 20 日在全省组织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 此起彼伏的食品安全事件, 刺痛了民众的神经, 也促使政府不断给力。从高层严词痛批行业道德滑坡、诚信缺失, 强调“重典治乱”; 到各地各部门紧密部署, 强调政府监管职责。中国正在打响一场“史上最严厉”的“餐桌保卫战”。

中国 13 亿多人口每天消耗 200 万吨粮食、蔬菜、肉类等食品, 共有食品生产企业 40 多万家、食品经营主体 323 万家、餐饮单位 210 万家、农牧渔民 2 亿多户, 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数量更巨。这些数字背后, 是更加庞杂的监管工作。这也决定了中国食品安全工作是持久战, 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说, 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 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 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食品安全, 人命关天, 自然会成为全国上下共同关注的问题。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有许许多多需要去落实的措施和踏实从事的工作。本期在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 推出“食品安全”专题, 祈盼引起您的关注。

要目

●本期专题/食品安全

台湾各地同步销毁塑化剂污染产品 286.441 吨

南京黑作坊致有毒物渗入盐水鸭

新华社再调查射阳“毒菊花”事件

食品安全在行动

控制食源性疾病要求食品供应每个环节共同预防

食品安全问题频发

城乡互助型农业有望破解难题

●国是论衡/中国须防楼市崩盘

●财经频道/朱四倍：“白内障”现象下的省级财政

●本期专题/食品安全

台湾各地同步销毁塑化剂污染产品 286.441 吨

近日，台湾各地同步举行塑化剂污染产品销毁活动，以展现“围剿”塑化剂的决心。来自台卫生主管机构的统计显示，全台当天合计销毁“染塑”产品 286.441 吨，共 11 个县市参与。

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上午到彰化主持了当地的销毁启动仪式。他表示，希望清除塑化剂的战斗顺利成功，同时也要全力防范其它的食品污染问题，相关主管机构要与厂商一起努力重建食品消费信心。

由于是全台同步销毁，因此台湾环保部门特别要求各地不可造成二次污染。以台北市为例，当天上午公开销毁 2.3 吨塑化剂污染食品，固态产品经过 850 度高温焚烧，塑化剂 DEHP 会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液态产品倒入污水处理厂，底下的污泥以后会清运焚化，避免造成二次污染。

近 20 天来，“塑化剂”从台湾普通消费者一无所知的专有名词变为当地媒体的每日头条，演变成一次席卷全台的塑化剂风暴。目前，岛内小至夜市、摊贩，大到知名饮料厂、五星级饭店、高价养生食品都遭波及，塑化剂影响的层面之广可谓惊人。

近来，岛内有关机构和民间团体已开始陆续成立咨询机构，协助民众向黑心厂商打官司索赔。不过有专家认为，就法律实务来说，民众要向厂商求偿需负责举证，如保留购物收据，且证明自己长期服用染塑产品，还得证明身体危害与塑毒有因果关系，不只求偿难度不小，

还得忍受旷日费时的官司历程。

有学者指出，所谓危机即转机，此次不幸事件如能教育大家在饮食上更小心并拒绝可疑的保健产品，同时也让食品制造商与卫生单位加强质量管理，“也算塞翁失马”。(2011-06-12 张勇 新华网)

南京黑作坊致有毒物渗入盐水鸭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近日，有南京市民向媒体反映，南京江宁湖熟镇宋家边村附近有一个加工盐水鸭的黑作坊，专用松香脱鸭毛做盐水鸭，安全隐患让人担忧。松香是工业原料，反复加热的话，有毒物质会通过扩张的毛孔渗入家禽体内。记者随后对市民反映的情况进行了一番暗访调查。

记者通过暗访调查发现市民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记者根据市民提供的线索找到了这家位于南京江宁湖熟宋家边的黑作坊，发现这是一处十分隐蔽的地方。村里人告诉记者，常常看到有拉着鸭子的车在这里进进出出。记者还没靠近，就有一股浓烈的鸭臊味混着松香味还有焦臭味扑面而来。记者看到在作坊门口停放的一辆农用车上，已经放着近百只等待被宰杀的活鸭。作坊内几名工人正忙着手中的活。记者上前打听这些鸭子是从哪里来的。一名工人支支吾吾地说了一句：“从附近农民家里收购来的。”然而记者表示想看一下这些鸭子的防疫证明时，工人称他们不知道有什么证明。

记者在屋内看到灶台锅里烧满一锅黑褐色液体。原来，加工鸭子时，那些不易剔除干净的小毛在这个锅里“打个滚”，出来的便是一只白白嫩嫩，连细毛都没有的“白胖鸭”。记者问工人锅里黑褐色液体是什么，工人实话实说的告诉记者是松香，因为“这样拔毛干净”。工人还表示平时不怎么用，只是加工量增大的时候，偶尔用一下提高效率。毕竟这样可以保证每只鸭子在经过拔毛后表皮的光滑。

随后记者向工人问起每天要宰杀加工多少只鸭子，加工好后送到哪里？工人称大概几百只，送去的地方都是老板亲自经手，具体他们也不太清楚，只是听说一般都是卤菜店、菜场等地方。记者随后向当地工商部门反映，可由于周末休息，并没有工作人员上班。今天上午记者向当地工商部门反映了这一情况，工商部门表示他们会立即调查处理。中国之声也将会继续关注黑作坊的调查处理结果。

新华社再调查射阳“毒菊花”事件

新华社得出两大结论与扬子晚报调查相符，“每年 200 吨入市”不实但确存安全隐患

1、“硫黄饼花”价格只有正常干花一半不到，“200 吨”之说无客观依据，硫黄熏蒸的菊花也是用于洗脚等保健行业。

2、2005 年起国家药典已明确禁止使用硫黄熏蒸菊花，但这一传统习惯依然是行业“潜规则”，洋马镇对零散种植户的监管仍有漏洞，致使一些“硫黄饼花”进入市场，存在被不法商贩利用的安全隐患。菊花产量占全国六成、每年向王老吉供货达 1600 吨的江苏射阳县洋马镇，近日被传出“每年 200 吨毒菊花入市”。媒体曝出这一新闻后，本报记者立即赶赴现场调查发现，200 吨说法有所夸大，而“硫黄菊花”一半会用于洗脚等保健业。昨天，新华社刊发详细调查，得出的两大结论，与本报记者的调查相符合。

洋马镇王老吉供应商之一的郭开亮表示，菊花分散花和饼花，所谓打硫黄，是用在一些饼花上，这部分暂时卖不出去、需要长期保存。确实有少数种植户还在制作饼花，并靠硫黄熏蒸保存，但绝对不可能有 200 吨，因为这种花已经几乎没有市场了。射阳县圣和中药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晓东分析说，如果是农户家制作的饼花，价格只有 20 多元/公斤，制作成本低，售价更低。这一说法得到药材村村民丁卫兵的证实，他家还有整整一麻袋的硫黄饼花，“现在大家都是卖鲜花，每公斤 9 元；6 公斤鲜花制作 1 公斤干花，也就是说，散花干品的价格为 54 元/公斤，饼花却只有 20 多元/公斤。”“硫黄打花，费时、费力、也不能多赚钱！”

药材村村主任韦荣友表达了相同观点，村里 900 多户有 800 多户在种花，谁都知道现在卖鲜花划算，方便、省心、赚钱还多，“老百姓都很实在，跟着市场走的，现在饼花几乎就没人要，200 吨？这个不合逻辑！”

根据洋马镇政府提供的一份情况说明，该镇每年种植菊花近 3 万亩，年产菊花干品 4500 吨，80%（约 3600 吨）用于茶饮，20%（约 900 吨）用于入药，少量用于沐浴、足浴等其他用途。当被问起目前的“硫黄饼花”作何用途时，近 20 位受访者都是脱口而出——广东那边收购用于沐浴业。

做了 20 年菊花经纪人的吕海天说，熏蒸过的菊花明显更白、泡开后味道更酸，稍微懂茶的人都能轻易分辨，但他也不敢保证，卖到外地后，有没有不法商贩将其制作成菊花茶去卖。

李锋曾担任射阳县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多年，在他看来，饼花用于洗浴本来无可厚非，因为硫黄确实有止痒、杀菌等效果，市场上还专门有硫黄香皂，“但不排除有少量饼花进入了饮料市场，因为洋马镇是提供原料，对终端市场控制不了。”

洋马镇镇长曹卫星坦言,这几年对硫黄饼花监管上确实有漏洞,主要是认为其数量极少所以不够重视,这次被推到风口浪尖,起先觉得意外和委屈,但后来明白如果硫黄饼花确实被不良商贩用于药材甚至菊花茶,作为源头的洋马镇也难辞其咎。

在调查中多位人士还提起,硫黄饼花还很难杜绝,和中药材行业使用硫黄熏蒸的情况很相似,因为硫黄熏蒸曾普遍用于中药材防虫、杀虫、保管,后来国家出台政策予以限制,但目前还是难以根治,成为行业的一个“潜规则”。

郭开亮说,这次有关“200吨毒菊花”的说法,虽然夸大事实,但也间接推动洋马镇“无硫化”的进程,毕竟食品安全大于天,他举例说,自己每年给王老吉供货,要接受对方31项质量检测,去年就因为有些花的颜色偏黑,被退回一整车的货,“在这些问题上,越严格越好,既对别人负责,更是做好自己产业的前提。”(扬子晚报6月13日)

食品安全在行动

如何保证食品安全?在5月24号,由中宣部、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农业部、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等部委和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共同举行了“中国政策论坛”,并且推出了《食品安全在行动》特别节目,就我们公众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共同寻找治理解决之道。

刘佩智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副主任

刘佩智:接连不断的食品安全问题,给人民群众的健康带来了损害,引发了消费者对不良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谴责,对政府监管部门的不满。食品的安全问题成了社会舆论的焦点,企业的主体责任不落实,政府监管部门的工作不到位,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举办的中国政策论坛,汇集了食品安全领域六大监管部门的96位决策者和专家。在现场,我们向他们发出了调查问卷。问卷调查中,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在日常生活中,您关注食品安全吗。100%的人选择了关注。

黄昆仑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院长

农业部转基因生物食用安全监督检测中心副主任

记者:日常生活中关注食品安全吗?

黄昆仑:我很关注。

徐景和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监管司司长

徐景和:我觉得食品安全,如何来评价食品安全现状,大家都非常关注这样一个问题

事实上，食品安全已经成为了全民关注的共同话题。屡屡出现的食品安全危机让老百姓不得不时时关注每日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过去国人一直强调色香味俱全，如今安全却成为了消费者选择食品时不得不首先面对的问题。那么在监管部门的眼中，中国食品安全的现状又是如何呢？问卷调查中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以 5 分作为满分，你对中国食品安全如何打分？64%的人选择了 4 分，32%的人选择了 3 分，4%的人选择了 2 分及以下。

黄昆仑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院长

农业部转基因生物食用安全监督检测中心副主任

黄昆仑：我觉得现在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应该是在 3 分到 4 分之间。

记者：为什么呢？……

黄昆仑：因为从目前来看我们的食品安全方面问题都是一些偶发事件，总体上来讲，食品安全的水平在提高。

周云龙 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副主任

周云龙：四分左右吧。

记者：为什么呢？

周云龙：我个人觉得目前国家对食品安全还是非常重视的，但是作为消费者而言确实有很多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但是我个人还是有信心的。

“重典治乱必须重拳出击。”事实上，国家今年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加强食品安全的治理。3 月 15 号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11 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把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违规活动作为首要任务。5 月 1 号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新法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处罚起刑点从“拘役”提高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5 月 13 号卫生部公布《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等 4 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其中规定所有食品添加剂必须在食品标签上明显标注。而今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涉及食品安全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 37 件 57 人。

钱永忠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标准研究中心副主任

钱永忠：影响农产品质量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农残留业超标等问题，另外一个违反添加。对农产品超标问题，我们想主要是加强管理、强化培训、规范使用，而对像瘦肉精这个违法添加物，我想我们应该是严厉打击、重点处罚，不留死角

尽管有连续出台的政策法规和多个部门共同监管，但是今年三月媒体却披露出了双汇“瘦肉精”事件，四月份上海盛禄食品有限公司分公司添加了色素和防腐剂的染色玉米馒头、

黑米馒头；随后使用尿素和兽药催生的豆芽，膨大增甜剂催生的西瓜等陆续浮出水面，一连串事件敲响了食品生产各个环节的警钟。

刘佩智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刘佩智：因为这个链条很长，种植养殖从农业部开始，生产制造加工从质检总局开始，流通领域里在工商部门，到了餐桌上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因此职责不清的问题，衔接不紧的问题，以及出现了问题呢，相互有点推卸责任的问题，这都是存在的。

陈晓华 农业部副部长

陈晓华：现在吃的安全的问题，摆在了突出的矛盾的位置。而我们人员的配备、经费的安排包括科研的力量都远远不足。所以我们现在是要补课。

我们问卷调查的第三个问题是：在食品安全方面，您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蔬菜中的残留农药、违规使用添加剂和养殖中滥用药品和化工产品占据了前三位，得票率分别是 43%、43%和 36%。转基因食品的得票率为 29%，注水肉和病死肉、重金属污染同为 22%，此外种植中滥用药品和化工品、食品卫生问题分别为 18%和 14%。

周云龙 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副主任

周云龙：我觉得食品安全方面首先还是一个卫生问题，其次我感觉大家现在，包括我在内，还是比较关注农药残留、兽药残留这些问题。

黄昆仑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院长

农业部转基因生物食用安全监督检查中心副主任

黄昆仑：现在有一些不允许使用的一些物质化学物质添加到食品，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面对着这些食品安全的隐患，消费者更为关心的是如何预防和治理这些问题。事实上，每一个食品安全问题的背后，往往存在着对于非法利润的追逐。

刘佩智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刘佩智：比如说往猪肉里的饲料里面添加瘦肉精，投入的成本呢？不到 8 块钱，一头 100 斤左右重的猪，喂养到 150 斤以上就出栏，时间不到一个月，与没有添加瘦肉精的猪呢相比，他赚得钱是在 24 块钱左右，300%的利润，诱惑没有良心的人，铤而走险。

同时，法律和监管上的漏洞也让一个又一个的问题食品成为了漏网之鱼。

蒲长城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

蒲长城：我们法律法规制度方面还存在一些漏洞，我们的监管能力还不适应，我们的监管措施还不到位，要把这些问题同时解决好。

形形色色的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活，而守卫食品安全依然任重而道远。

黄昆仑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院长

农业部转基因生物食用安全监督检查中心副主任

黄昆仑：我觉得这个需要各个地方部门，把一些食品安全监管一些列入长效机制，并且要提供一些我们所说的把它列入到一些财政方面预算里面去，因为要进行监管可能需要投入，投入必须有这种长期投入，才能够实施一个长期监管。

主持人：一锅清水，加上一滴香料马上香飘四溢；一块臭猪肉，加上一块香膏马上变成美味可口的牛肉；发霉过期的馒头加上香料染料，马上就变成刚出锅的杂粮馒头等等等等。这不是变魔术，而是添加剂让腐朽变神奇。据了解，中国现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有 2400 多种，没有列在其中的添加剂则是不允许在食品当中出现的。那么，人们对如此众多的食品添加剂又了解多少呢？

我们调查问卷的第 4 个问题是：对于食品添加剂，您的观点是什么？其中 50% 的被调查者认为所有的添加剂，不管有害无害都应该明确标示出来；有 39% 的被调查者认为为了色香味，适当使用添加剂无害；有 25% 的被调查者认为即使是食品添加剂，在食品中也应该尽量少用；18% 的被调查者认为添加剂有害，不应该在食品中使用；

许文涛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

许文涛：食品添加剂是要用的，并且必须要用的，但是越少，适可而止对吧，你保持它的色香味，你可以保持，但是你不要滥加，什么都加，食品添加剂必须要用，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没法保证食品的保质期，运输这都不可能的。

1996 年，我国出台《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此后，添加剂开始大量应用于食品加工，现在，食品添加剂已经渗透到粮油、肉类、果蔬等各个加工领域，同时也是烹饪行业所必需的配料。

黄昆仑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院长

农业部转基因生物食用安全监督检查中心副主任

，黄昆仑：我觉得食品添加剂的话是现代食品工业发展必不可少的物质，那么如果没有食品添加剂，我们的现在的食品工业是没有办法发展的。

事实上，食品添加剂在我国使用已经由来已久，东汉时期开始用盐卤、石膏作为凝固剂制作豆腐、南宋开始用矾和碱做的油条等等，至今尚未发现，长期吃这种食品产生的中毒事件。专家认为，如何正确看待食品添加剂，成为摆在人们面前需要迫切思考的问题。

徐景和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监管司司长

徐景和：现代食品添加剂是我们现代食品工业很重要一个手段，食品添加剂本身来讲像一个武器一样，一个工具一样，本身没有什么，今天好和今天坏的问题，是如何来使用的问题。

首先消费者无需对列入食品加工标准可以被使用的添加剂过度恐慌，但是专家同时也认为，目前有一些商家为了谋求一些私利，在使用食品添加剂存在着滥用的现象。总体来说，在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上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非法使用不该使用的添加物，如苏丹红等，二是对合法使用的添加剂进行超量使用的问题较为严重。

许文涛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

许文涛：要严格按照国家的标准，把它限量，不然就是过犹不及

黄昆仑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院长

农业部转基因生物食用安全监督检查中心副主任

黄昆仑：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食品安全委员会都对食品添加剂做了一个限量的要求，你这个限量不能够在食品加工过程中超过这个限量，超过这个限量就会存在安全方面的隐患，如果只要我们企业和食品生产加工者能够按照这个要求，按照国家的要求添加这些食品添加剂，是应该没有问题的，应该是安全的

这是被曝光的上海盛禄食品有限公司做出的染色馒头，标注的食品添加剂是维生素 C，但事实却是用甜蜜素、防腐剂山梨酸钾和柠檬黄，并且工人们在添加各种添加剂时非常随意，完全是按照自己的经验，想添加多少就添加多少。

记者：山梨酸钾是做什么，是什么功效

工人：防霉的呀

记者：防发霉的是吧

工人：对

记者：用它之后保质期可以时间长一点？

工人：对，保质期长

除此之外，在安徽、江西、福州等地的餐馆还发现，有一种叫牛肉膏的添加剂，经过 90 分钟的腌制可以让猪肉变成牛肉，50 斤的猪肉就可以节省上千元的成本。而添加了苏丹红色素的鸭蛋使蛋黄看起来红润鲜艳。这些滥用甚至非法使用的食品添加剂都给人体健康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近日，台湾首次查获的饮料食品违法添加有毒塑化剂、起云剂，涉及 64 个厂商 94 种产品。国家质检总局迅速对此事进行了追踪调查，新闻发言人李元平今天表示 2011 年 3 月在上

海进口的 792 箱悦氏运动饮料可能含有起云剂。截止到 26 号晚，已从市场上回了 4800 余瓶。国家质检总局将保持与台湾方面的沟通，并根据事件的进展情况进一步采取相应措施。

王东峰 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

王东峰：上链生产环节，下接餐饮服务，对于发生在流通环节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要快速去处置，依法的处置，严厉打击，切实保护好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陈宏啸 卫生部副部长

陈宏啸：已经公布了新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176 项，例如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了 16 大类食品当中的 23 类 2314 种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和使用剂量。

前不久，卫生部刚刚公布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等 4 项新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4 月 23 号，国家重申食品和饲料中非法添加名单，具体有吊白块、苏丹红、王金黄等 47 种可能在食品中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膨松剂、着色剂、乳化剂等 22 种易滥用添加剂，盐酸克仑特罗、沙丁胺醇等 82 种禁止在饲料动物饮用水和畜禽水产养殖过程中使用的药物和物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非法添加行为性质恶劣要受到刑事追究，造成严重后果的甚至会判处死刑。

主持人：尽管现在人们对食品添加剂谈之变色，但实际上没有食品添加剂就没有现代食品工业，只是滥用的食品添加剂使食品变成毒药，有一些食品添加剂至今还没有添加标准，也增加了人们对食品添加剂的忧虑。除了食品当中的添加剂的安全性之外，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也是近年来学术界乃至居民生活中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那么对转基因食品大家又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植物诞生，从此转基因这个概念开始出现在公众视野。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也开始走上餐桌，但是围绕着转基因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下来。支持者认为改良了品种，增加了产量；而反对者却因为没有办法评估它的危害性而忧心忡忡。那么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大家如何评价转基因食品呢？

我们调查问卷的第 5 个问题是，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发展和普遍上市，你的态度是什么？其中 64% 的人选择了中立观望，有 22% 的被调查者表示消极抵触；而 14% 的被调查者表示积极支持。

黄昆仑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院长、农业部转基因生物食用安全监督检查中心副主任

黄昆仑：我现在的观点认为，所有的转基因食品我们要根据个案评估的原则，要根据一个安全的评价，规范地要求来进行评价。就是要把它可能会发生安全方面的风险要进行科学

一些实验，来证实它是安全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批准它进入商品和食品市场，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

转基因是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在形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们所需要的目标转变。在世界上，转基因作物真正的商业化是从1994年美国孟山都公司种植的转基因西红柿上市开始的，至今流通已有16年。在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对转基因作物的研究，从1999年我国水稻研究所研制的转基因杂交水稻通过了专家鉴定后，转基因食品在中国迅猛发展。但同时，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争论不断，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成为争议的最大焦点。

徐景和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监管司司长

徐景和：全世界都关注转基因食品问题，因为有人担心转基因食品对健康问题，对环境问题有没有影响。

美国作为世界上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一直积极推动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也是转基因食品最大的出口国。但是以欧盟为首的国家，却在坚守底线，强烈抵制转基因食品的进入。在日本，82%的消费者持否定态度并对转基因食品的标志需要严格的IP认证。尽管世界各国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不一，但转基因作物在世界上的种植面积，从1996年至今增长了80倍。随着转基因食品的上市，更多的标注“非转基因”的食品也随之产生，人们在以自己的行动对转基因食品进行着抵制。2009年8月17日，我国农业部首次为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系颁发安全证书，这意味着在2-3年后，中国百姓的餐桌可能会有一种合法的新主粮转基因大米。这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关于转基因的质疑不绝于耳。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却对转基因的态度很开放。

记者：如果现在餐桌上有转基因的水稻，转基因的米饭，您会选择吗？

袁隆平：我本人会吃。

记者：那么如果说我们要推广大面积的商业种植，您是持支持的态度还是？

袁隆平：我是持慎重态度，当时吃可能没有问题，如果长久吃是不是有问题呢，是慎重的态度。不是绝对的否定它的态度。

在选择中立的调查者中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原因。其中有18%的人选择了不了解，而82%的人认为很多负面影响是在很多年后才显现的。对于这一点，袁隆平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心。

袁隆平：可惜我年纪到了，它不是吃三天五天呢，起码要吃一年两年没有问题啊。吃了五年八年都没有问题，大胆吃西瓜了。最好是找青年志愿者，他吃了五年之后他没有问题，他的儿子也没有问题，也没有遗传了，那就下结论，no problem。

对于转基因技术未来的发展前景，专家的看法各有千秋，32%的被调查者认为前景很好；有33%的人认为比较好；有31%的被调查者认为前景一般，4%的人认为很差。

周云龙 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副主任

周云龙：任何一个新技术的发展我觉得都有利弊两个方面，关键这个技术是不是能够促进整体的社会利益，能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当然对它可能存在的危害，我也知道，我们国家还是有法律来管这个事，还是有很多部门在替老百姓来把关。

专家对转基因技术的未来发展各有不同意见，但对其推广和商业化使用普遍觉得需要慎重对待。

张国 农业部市场与信息司综合处处长

张国：作为转基因产品，它是世界上一个科技，一个前沿的东西一个高科技。那我们如果不研究，我们在国际上就会落后。我们应该加强这方面研究，但是在推广使用上我们要慎重。

黄昆仑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院长

农业部转基因生物食用安全监督检查中心副主任

黄昆仑：转基因食品我们就是要有一个管理，这个管理就是说要按照咱们国家的要求，还要按照国际上一些，像我们国际食品发展委员会出台了三个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这么一个准则或者相当于一个标准，按照这个来进行严格来安全评价。确保它是安全的。

半小时观察：

食品安全可以说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新问题。每年都会有治理行动，但每年都状况频出。不但屡禁不止，反而花样翻新，只要想得到，就有人能够做得到。以至于非要自己种菜做饭才安全。但是在现代社会，节奏日益加快，分工日益精细，自产自销无异于社会的退步，显然是一件行不通的事情。

那么谁来保证一个安全的食品环境呢？事实上关于食品安全的监管机构越来越庞杂，条文法律越来越多，检测手段也是越来越现先进，但是重重的围堵，却仍然难逃猫鼠游戏的恶性循环。一方面是道德体制的缺失让食品安全陷入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尴尬境地，而另外一方面监管体系的缺损也让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

实际上从田间地头、到餐馆工厂，每个人都依赖这个食物链条，每个人都是食品安全事故受害者，谁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害人终会害己。当餐桌变成一场危险品的盛宴，全社会的人都应该反思，商业社会之下，短期的逐利背后显示了整个社会的浮躁和暴戾之气。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够单靠哪个部门，要靠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经济半小时》）

港媒：内地开始质疑食品添加剂癖好

【香港《南华早报》6月11日报道】题：中国开始质疑对食品添加剂的癖好

内地的厨师似乎找到了满足顾客味蕾的最好办法。到北京最大的食品批发市场新发地市场的一家食品添加剂超市去看一看就明白了。

想省时间省钱吗？在水里加上少量“一滴香”顿时就成了一锅熬了一天的肉汤。想让牛肉更鲜嫩吗？不用担心，加一种粉末就可以做出一锅看起来十分美味的牛肉。食品行业对于这类人工调味料和增色剂十分自豪，新发地市场上悬挂的巨大横幅“食品添加剂是食品工业的灵魂”就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最近发生的涉及食品中非法使用某些物质的事件破坏了公众对该行业的信心。国有媒体报道说，内地成年人平均每天要吃到90种食品添加剂，媒体对许多添加剂的使用是否必要提出了质疑。

但是食品安全专家说，这些添加剂可以改善口味和色泽，有助食品保存，使食品便于运输。更重要的是，如果根据上个月公布的标准来添加，这些添加剂是安全的。不过，添加非食用性物质是犯罪行为，例如用“苏丹红”给蛋黄增色，在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或让猪服用“瘦肉精”等。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所长严卫星说，迄今为止，我们好像尚未发现食品添加剂造成的一例食品安全事故。内地批准了23类共2400种食品添加剂，例如增味剂、色素和防腐剂。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吴永宁说，添加剂可以用来使食品更好或更美味，但不能用来遮盖缺陷或腐败的食品，这是基本原则。

严卫星为食品中普遍使用添加剂的做法辩护，说即便最敏感的人每天食用添加剂也是安全的。

但是公众怀疑，食品生产商没有严格执行有关食品添加剂的法规，他们吃的食品跟看上去不是一回事。

今年4月，广东中山有关部门发现了用玉米、墨汁和石蜡制成的红薯粉条，上海超市出售用非法着色剂和甜味剂加工的过期馒头。

三聚氰胺也许是最好的例子。在2008年9月之前，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这种工业用化学品，他们也根本不会想到奶制品生产商为了通过蛋白质含量检测而在原奶中添加这种物质。在至少6名婴幼儿死亡，30多万婴幼儿因此患病以后，如今这种化学品的名字已家喻户晓。

北京意识到了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不满。媒体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政府应为此承担最大的责任。

政府上个月说，在食品中添加非食用性物质或滥用食品添加剂已经成为最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并下令对此类违法行为进行为期一年的打击并严厉惩治不法生产商。

吴永宁说，政府让不同机构监管食物链的一个环节的做法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更实际的做法是让不同部门监管不同食品，并负责整个生产过程。

与此同时，新发地的商贩们已经收掉了调味剂和其他食品添加剂。一名商贩说：“等到控制没这么严的时候再来吧。”

【美联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中国国家媒体今天说，一名商贩因为向肉类中添加工业级亚硝酸盐导致一人死亡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一严厉的判决显示出政府打击食品和其他产品化学污染泛滥的行动力度。这个问题已经在中国造成一次又一次健康恐慌，败坏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声誉。

新华社报道，高艳军 9 日被宣判。去年，一名男子食用在她的摊位购买的猪小肠后身亡。政府认定死因是中毒。

报道称，高艳军为改善肉的色泽和质地，添加了通常用于化学肥料的非食品添加剂亚硝酸盐。(新华国际)

控制食源性疾病要求食品供应每个环节共同预防

我们今天重点讲的是从农场到餐桌食源性感染，主要讲怎么样从农场到餐桌的全过程来控制食源性感染，作为消费者我们怎么来防止减少食源性感染。

凤凰网健康：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两位专家，一位是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冉陆教授，另一位是来自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美国 CDC 的专家 Dr. Angulo，欢迎二位。下面我们会和二位专家讨论一下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

凤凰网健康：首先我想请教二位，对食品安全和食源性传染病的普遍关注是哪些？

Dr. Angulo：全球范围的食源性疾病可以导致很多疾病，其中很多是严重的传染病。这个严峻的问题要求食品供应中的所有人共同采取预防措施。

冉陆：今天我们准备这个话题的时候，食品安全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但是我们今天可能重点讲的是从农场到餐桌食源性感染。从农场到餐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食品从种植、养殖、运输、生产、加工、销售整个的过程，一直到我们食用，它有很长的一个过程。食源性感染我们一般是指细菌性的、病毒性的、寄生虫性的病源，通过食品，通过我们吃食物感

染到自己,我们今天主要的专题是讲这个,怎么样从农场到餐桌的全过程来控制食源性感染,作为消费者我们怎么来防止减少食源性感染。

食品安全是我们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每一个消费者都希望我们吃的食品是百分之百的安全,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必须面对百分之百安全的食品,零污染的食品,我们现在还是很难做到的。这是为什么呢?

比如说,像我们人会得病,那么动物它也会得病,人在这个动物的饲养过程里面会带很多的致病菌,有一些动物会发病,有的时候动物不发病。但是动物感染了这些致病菌,它会通过动物的粪便去污染食品、水,也会污染到食品。所以动物性的食品,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肉、蛋、奶是很容易,或者是经常有机会,被这些细菌病毒寄生虫所污染的。

那么我们消费者要做的事,就是在整个食品的过程里,比如说在运输、加工、储存的过程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正确的预防、防止受到这些感染,这是我们今天主要想说的。

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

安全的食品,首先它是生产出来的,那就是涉及到每一个环节,大家都为食品安全负责,那我们食品安全就会有很大的改观,我们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我们的余地就很小了。

凤凰网健康:刚才我们谈了很多关于我们的政府可以做什么,我们的专家有哪些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然后我们的医疗机构可以帮我们做哪些事情。但是我想听二位专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如何帮助提倡食品安全这个问题呢?

冉陆:食品安全刚才我们说了,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从农场到餐桌。那么这个食品生产现在整个的环节是越来越复杂,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是种植出来的,是养殖出来的,我们人人都要吃饭,都涉及到这个食品。在生产过程里面,涉及的人也很多。

所以我要想想有安全的食品,首先它是生产出来的,那就是涉及到每一个环节,大家都为食品安全负责,那我们食品安全就会有很大的改观。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经常会有消费者问我,我怎么样选择一个安全的食品?那食品首先是生产出来的,我们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我们的余地就很小了。

第二个,就像刚才说的,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所以经常也有一旦出了食品安全的事故,经常有很多消费者就在抱怨,说政府你怎么没有去检查相应的机构,你为什么没去检验。我还是想强调,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不是检验出来的,也不是消费者能够选择出来的。首先这是最重要的。那么第二个,我们也说了,我们今天讨论的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食源性的感染,刚才说了感染有细菌性的、病毒性的、寄生虫性的,这些东西都是活的,在食

品里头是可以繁殖生长的。既然它是活的，它也会死，它怎么才会死呢？它怎么才会不繁殖呢？比如说不适合它生长的温度，它就不繁殖。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加热。

所以其实我们中国的这个烹调里头有很多很好的习惯，就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加热、煮透、煮熟。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吃鸡蛋，基本上都要煮得完全凝固了，外国人他们吃鸡蛋，基本上就吃那个半凝固的，甚至是稀的。大家都知道外国人吃牛排要吃半生的，实际上生物性的食品肉、蛋、奶，只要是加热充分烧熟煮透，那么就是最好的预防食源性感染的一个办法。

你烧熟煮透了以后，我们刚才说了，生的是容易有污染的，熟的是你已经消除了这个污染的。在厨房里面还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你生的和熟的要分开，你加工的手，你做了生肉，摸了生的鱼，你再去摸熟食之前，一定要洗干净。然后你的厨房、案板所有的容器，都要生的、熟的分开。

Dr. Angulo: 消费者促进食品更加安全的一个途径是消费者生病时去看医生，在医院让医生采集样本，并诊断出发病原因。如果发病原因是细菌，那么就能够在实验室里确定是哪种细菌，然后通过对疾病的调查找出污染的源头。所以，消费者可以做的是在生病时去看医生，并且让医生采集样本，这样我们就能够找到发病原因。

五个关键的控制食品安全的措施

世界卫生组织给我们五个关键的控制食品安全的措施，要保持清洁，要生熟分开，要烧熟煮透，要在安全的温度范围内保存食品，要在 5 度以下 70 度以上，还有就是要安全的水，要新鲜的原材料。

凤凰网健康：在预防食源性疾病方面，还有哪些日常的行为，我们是应该注意的，你们二位有没有一些建议？

冉陆：我想世界卫生组织曾向全世界发布过，食品安全五个关键性的预防措施，而且它是公布在世界卫生组织网站有各种语言，也有我们中文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这五条关键性的措施是什么？

第一是保持清洁，这个清洁首先是我们手的清洁，洗手很重要，厨房的清洁、容器的清洁。

第二个，其中我们刚才也都说过了，生熟分开，生的熟的在加工容器上不要互相接触，容器都是分开的，防止交叉污染。

第三，烧熟煮透刚才我们也反复说了，只要烧熟了煮透了，生物性的因素就都可以去除了。

第四，保存食物要在安全的温度下，在超市里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有些东西是保存在冰箱里面的，冷柜里有一些是四度，如果我们去吃自助餐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冷菜是摆在冰上的，有一些底下一直加着热的。为什么？大家要记住，我们保存食物安全的温度，要么你在 5 度以下，要么在 70 度以上。5 度到 60 度之间，保存食品是不安全的，一些微生物一些细菌是会在在这个温度里繁殖生长的。

第五条，是食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为什么呢？我们要说安全的水，大家知道我们要洗手，如果你这个水是已经是污染的，你的手还洗得干净吗？我们洗碗、洗菜、洗水果，我们用的水应该是安全的。所以虽然我们城市管道的水，一般都是经过处理的，为什么当这个灾害的期间，在水源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要强调，对这个水源要消毒要煮开，这个也是为了安全。

还有一个原材料就是不管是蔬菜、水果、肉、蛋奶，我们都尽量要选新鲜的来买，要在最短的时间把它食用完，不要保存太长的时间，所以要用安全的水，和新鲜的原材料。

我想再重复一遍，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给我们五个关键的控制食品安全的措施，要保持清洁，要生熟分开，要烧熟煮透，要在安全的温度范围内保存食品，要在 5 度以下 70 度以上，还有就是安全的水，要新鲜的原材料，就这些。

Dr. Angulo: 我们已经说过，食源性疾病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面临的常见问题，在美国，食源性疾病很常见，在中国，食源性疾病也很常见。我们必须加大力度，采取措施预防食源性疾病。我们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养成洗手的习惯。但是，在解决食源性疾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整个食品链中进行预防，从农场到加工地点、市场和厨房，我们都要采取更多措施，以保证食品安全。

凤凰网健康：现在我们对食品安全这个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有了更多的了解，由于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有限，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冉教授，也非常感谢您。

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一定要与官员政绩考核挂钩

在“毒豆芽”、“墨汁粉条”、“染色花椒”等一批食品安全案件被披露后，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纷纷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推行食品安全整治区(县)长负责制。吉林开通 24 小时投诉举报热线，聘请 1300 名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

应该说，时下食品安全问题的多发，除了从业者缺乏道德约束之外，很大程度上也缘于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甚至趋利避责的监管体制。

食品安全事故的暴发，充分暴露出政府监管链条的失职，但最终往往是几经推诿之后，以链条末端的升斗小民被绳之以法、施以重罚而画上句号。而大的利益集团却能够在食品安

全事故中全身而退甚至卷土重来，养鱼式监管也往往因其**潜规则**而法不责众地继续逍遥。食品安全问题的根基非但没有因为一起起触目惊心的事故被连根拔起，反倒屡屡“大难不死”。

从这个角度来看，建立将食品安全纳入官员政绩考核，出了食品安全问题，官员必须承担责任的问责制度，无疑将有助于厘清责任，杜绝推诿。对于官员来说，当关乎政绩的不仅仅是GDP，当食品安全也同样关乎头顶的乌纱帽时，才会更有动力加大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养鱼执法”也才有望从根本上得以消除。

而对于民众来说，食品安全问题究竟出自哪个环节，往往并不那么一目了然，即便是追溯到了导致问题的环节，这些环节有没有为这类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埋单的实力，也同样需要打上个问号。这个时候，食品安全问题其实并不能甚至很难只由制造者来担责。既然政府有向公众提供安全食品的责任，那么，一旦出现了食品安全事故，公众其实更应首先追究政府的失职，并由政府先行提供赔偿与保障。

基于上述视点，将食品安全纳入官员政绩考核无疑是值得期待的，但是，更为关键的是建立起食品安全事故由政府承担第一责任人的机制。当然，食品安全仅仅与官员的乌纱帽挂钩其实还不够。按理来说，政府官员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岂有不对自己的食品安全问题负责之理？然而，当某些政府官员的餐桌能够享受特供的安全食品，要想让他们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真正感同身受，自然也就不切实际。从这个意义上说，取消并叫停政府部门的食品特供，让食品安全也与官员的健康和性命挂钩，到了那个时候，食品安全才能真正成为政府官员自发的诉求，食品安全局面也才有望得到大的改观。（6月13日 [检察日报](#)）

食品安全问题频发 城乡互助型农业有望破解难题

两个烦恼：有钱难买安全食品，绿色农产品遭遇“卖难”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市民汤先生连日来一直在关注台湾塑化剂事件。“媒体上说，很多食品、保健品都含有塑化剂成分，食品安全问题真是防不胜防。”

汤先生说，自己以前对食品安全并不太在意，和妻子二人还经常光顾路边摊，“买东西也会货比三家，选择价格相对便宜的”。但近两年来，食品安全事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让汤先生不敢再到路边摊或小吃店用餐了，“这些地方是地沟油的”重灾区”。

开始关注食品安全和自身健康的汤先生被迫“转战”到大型超市购物，非高价不买、非品牌不买，这使得家里每月平均食品开支比以往增加400多元。本以为这里的食品安全有保证，“可双汇”瘦肉精事件”和上海”染色馒头事件”接连发生后，我们感到大超市、大品牌也不怎么靠谱”。

让汤先生更加揪心的是，一位做进口红酒生意的朋友曾向他“自爆家丑”：部分经营红酒的商人从包装到商标的印制都由自己一手包办，为延长红酒在超市的时间，通常他们会采取在包装上把红酒的出厂日期往前延伸、保质期拉长的办法，如一瓶 2008 年出厂的红酒，经销商可能会将生产日期印制为 2007 年；一般瓶装酒的保质期是 3 年至 5 年，而他们会印为 8 年。过期红酒的亚硝酸盐含量比保质期内的红酒含量高，而过量的亚硝酸盐会致癌。

这让平时喜欢喝红酒的汤先生有点心惊胆战。“红酒如此，更何况别的食品？”汤先生很烦恼，自己愿意多花钱，但为何难买安全食品？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当前持有汤先生这种想法的市民为数不少。一方面，他们的收入水平大大提升，改善生活品质的愿望强烈；但另一方面，市场上提供的食品很难满足他们的健康需求。

今年，河北农业大学的师生在保定市随机选取 5 个成熟社区的 150 位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消费能力高、健康意识强烈的受访者对农产品的安全性呈现出高度关注，希望获得更安全健康的产品，而这一群体对价格不太敏感，有意愿也有能力为健康多投入。

“要是农产品少打农药，不用激素，哪怕价格贵一点都可以接受。”采访中，记者听到不少市民这样说。

看来，有机农产品、绿色农产品很有市场啊！一开始，河南省兰考县南马庄村支书兼农民合作联社理事长张砚斌也是这样想的。可让他没料到的是，村民辛苦一年种出来的绿色有机农产品还是遭遇了“卖难”。

南马庄位于兰考县西，是该县的重点贫困村。南马庄交通不便，停电断电时有发生，尤其每逢下大雨，连出村办事都很困难。正因为如此，农民的生猪较外村每斤要少卖一角钱，大米每斤少卖几分钱。

2004 年 9 月，在兰考县副县长何慧丽(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当时在兰考县挂职任副县长)的推动下，南马庄村支部和村委会利用兰杞干渠从村东流过，农田内毛渠纵横，水利条件 便利的优势，引导农民成立了合作社，打起了生态农业的“主意”。

张砚斌说：“设想之初，觉得既然公众关注食品安全，绿色生态农产品自然能得到消费者的青睐，肯定会因此扭转生猪、大米都比外村贱卖的困境。”

然而，2005 年第一批有机大米成熟后，却无人问津，销路成了当地农民最头疼的事。眼看着有机大米和生猪陷入滞销，何慧丽也顾不上副县长和副教授的身份，带领干部群众到郑州、北京的路边支起了小摊，向市民推荐南马庄的绿色有机农产品。

有市场，无销路，这让张砚斌很烦恼，也让许多有志于发展有机农业的人望而却步。为

什么会这样呢？广西南宁市良庆区那马镇昌盛无公害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经理韦文昌道出了其中的缘由。

韦文昌说，他们合作社于 2008 年正式成立，目前有 19 个产品获得了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标识，消费者根据标识上的 16 位数码就能查出蔬菜的产地等相关信息，但受市场上无序竞争的影响，合作社的品牌效应并未凸显，市场占有率受到很大冲击。

“据我调查，目前市面上不少蔬菜都打着无公害的招牌，在产品包装上标识“无公害蔬菜”的字样，其实是打“擦边球”行为，本身并不具备相应的资质。”韦文昌说，这种行为使市场上的绿色农产品真假难辨，难以取得消费者的信任，价格上不去，菜农自然不会去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显然，不信任的结果只能是劣币驱逐良币。何慧丽认为，问题出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缺乏必要联系，因此难以建立信任。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何慧丽和张砚斌以南马庄为试点，利用农民合作社的优势，开始探索城乡互助的生产消费模式，希望以此保障生态农业的健康发展和安全食品的有效供应。

变化，来自城乡互助型农业

最近几年，由于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引发了公众担心。为了寻找安全食品，一种由生产者、消费者共同参与的城乡互助型农业新模式悄然而生。这种模式，既满足了一部分市民对食品安全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从事绿色生产的农民所遭遇的困境，逐渐受到人们的青睐。

菜农直供、市民下乡：“吃到了和小时候一样味道的菜”

送菜日期：5 月 27 日；菜品：圆白菜、黄瓜、小白菜、油菜、菠菜、紫叶生菜、水萝卜、莴笋这是北京“菜农人家”农场给市民的一份送菜清单。

和市面上大部分蔬菜相比，这家农场送出的蔬菜外观上不怎么好看，但它们在生长过程中没有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催熟剂等，是纯粹自然生长的当季蔬菜。

郑祥春是“菜农人家”150 多位客户中的一员。他告诉记者：“我们这些人家里有小孩的比较多，主要考虑的是健康。现在市场上都是化肥种的菜，这里的菜用的是农家肥，跟我 20 多年前小时候吃过的是一个味儿。”

记者了解到，这种直接与市民签订合同的农场，开始在全国各地受到消费者的追捧。他们一般采取消费者预付费的方式，农场则根据消费者要求，生产安全、无公害的农产品。仅在北京，目前就有 8 家农场实施这种新模式，菜农按照固定时间将菜地里生产的原生态绿色蔬菜，直接送到社区居民家里。

与此同时，为了吃得安全，干脆自己动手、“到农村种菜去”，在全国一些城市也正在成

为一种新时尚。

“刚种了两个星期，我这小萝卜苗很快就能吃了，瞧这水灵劲，可比市场上卖的强多了。以前买回来菜，要考虑浸泡、削皮或是用臭氧机，现在，菜园的菜拿回家，洗掉泥土，很多都是生着吃，吃菜再也没有心理负担了！”在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里，市民张斤绣蹲在自己租种的菜地里，一脸幸福。

作为一家为客户提供自种菜地和配送蔬菜服务的新型农场，“小毛驴市民农园”占地 130 亩，目前有将近 700 个客户。在这儿，每天都有会员来自自己的地里浇水、施肥、锄草、移苗、收获。到了周末和节假日，这里更成了不少家庭的乐园，大人在自家的地里忙得不亦乐乎，小朋友则打着赤脚穿行在田垄间，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北三环城乡接合部的良时开心菜园，占地 100 亩。菜园投资人梁田告诉记者，消费者认租一分地就成为会员，菜园免费提供种苗和各种耕作用具。如果消费者无暇亲自照料，菜园还能提供保姆式代管服务，聘请农民施农家肥，对病虫害采用黄板、黑光灯等生物防治方法，会员可以随时监督种植过程……

在食品安全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目前这种可称为“城乡互助型农业”的绿色生产、消费新模式，在全国正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中。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目前已有同类农场 100 多家。而据专家介绍，这种模式在国外发展很快，如在美国此类农场有 5000 多个，为超过 200 万户家庭提供服务；日本的比例则更高，有机食品的消费市场中，直销形式占到一半以上。

消费者联盟、农民合作社：“互相寻找中的两股新生力量”

在郑州市内一个小区见到姚卫华时，她带着女儿正在给“守护家园绿色消费联盟”的会员分发刚刚从黄河滩边农场里采摘来的新鲜蔬菜。和姚卫华一样，许多会员也都是刚刚接完幼儿园放学的孩子，顺路过来领菜的。

今年 3 月刚刚加入联盟的张露霜说：“以前吃菜，总是担心污染，现在经过联盟比较、选择，吃的菜都是自己看着在有机土壤中长大的，没什么不放心的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城乡互助型农业发展过程中，一些消费者感觉个人在市场上的选择、判断能力有限，于是开始联合起来，组成消费者联盟，通过集体的力量寻找安全食品。这是城乡互助型农业发展中的新苗头。

姚卫华告诉记者，成立“守护家园绿色消费联盟”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前几年怀孕期间，嗜好黄瓜的姚卫华发现存放的黄瓜竟出现了膨胀的情况，由此萌生了“自己到田间地头找安全菜”的想法。后来，她找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消费者，2010 年 8 月，正式成立了“守护家园绿

色消费联盟”。联盟经过仔细调查后，决定与郊区黄河滩边专做绿色有机农产品的“大草帽”农场合作。“去年试运行，我们只挑选了 20 户参与，今年春季扩大到了 80 户，以后内部机构完善后，肯定还会扩大规模。”姚卫华说。

无独有偶，2010 年 3 月，北京市回龙观社区一群热心妈妈，为了孩子的健康，四处寻找健康的食物。由于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妈妈们借鉴台湾主妇联盟的形式，在回龙观和天通苑地区成立了社区健康消费团体绿之盟。目前，北京凤凰公社、圣林农庄、天福园等农场都陆续加入进来，与她们建立了合作关系。

消费者联合起来寻找生产者，而生产者也在联合起来吸引、服务消费者。

一度为绿色农产品“卖难”发愁的河南省兰考县南马庄如今有“中原第一合作生态村”的美誉。2006 年，南马庄向消费者推出了“购米包地”的模式，即消费者预付一定的定金，在南马庄包下一块有机水田，由合作社派农民专人负责耕种，成熟后再由合作社统一配送给消费者。这种模式成功后，南马庄农民合作组织日益壮大，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南马庄农民合作联社”，下设生产、养殖、文艺、资金互助等多个专业合作社。

南马庄人也切切实实体会到新模式的好处。村支书兼农民合作联社理事长张砚斌说：“现在我们的绿色大米每斤平均要比市场价高出 1 毛到 4 毛，小杂粮比市场价高出 5 毛到 1 元，用本地黑猪品种养殖的“快乐猪”每公斤价格比普通生猪高出 3 倍，一头猪就能净挣至少千把块。”

据了解，进行这种探索的并非只有南马庄。2011 年初，在距南马庄不远的胡寨，村民王纪伟的胡寨哥哥农牧专业合作社，开始依托兰考县内的消费者资源开展“宅配”业务：合作社在消费者预付定金后，按照其个性化的蔬菜种类选择，定期将安全、新鲜的蔬菜直接配送入户。王纪伟说：“为了让消费者放心消费，我们在标签上都写有箱内蔬菜生产者的名字，还有蔬菜种子以及肥料使用等相关情况。”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认为，从更大范围来看，要让更多消费者、生产者参与到互助型农业中来，就必须走合作之路。目前，城乡合作型农业中的农业合作社和消费者合作社，在全国还处于新创阶段，是互相寻找中的两股新生力量，将来实现他们之间的对接，是城乡互助型农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破解食品安全难题的有益尝试

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如加强监管、建立健全食品检验标准等。而城乡互助型农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启示：发挥消费者和生产者本身的力量，培养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互信，未尝不是解决问题的一条途径。

“小毛驴市民农园”发起人石嫣说，“城里人给乡下人造假，乡下人给城里人投毒”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形象地刻画了目前生产者、消费者间互不信任的状态。城乡互助型农业的主要内容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共担风险和共享收益，其实质就是在二者间建立互信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逐渐形成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良性互动，有利于破解食品安全僵局。

在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兴隆镇罗家店开办“果园香猪生态园”的罗宇，至今已经经营 10 年。在罗宇的生态园里，香猪是经济支柱。之所以叫“香猪”，是因为这些猪是以玉米、草料喂养，肉质的香味是普通饲料喂养的生猪无法比的，价格也比普通猪肉贵上好几成。目前，这个生态园的客户已经发展到了成都市华阳、温江等城区的 50 多个居民社区。

罗宇认为，与消费者间形成的互信是农场能够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因为他的农场前些年经营状况并不好，通过这些年人们的口口相传，才使得他的客户越来越多。成都市武侯区桐梓林社区居民田波成为会员已经 4 年多了，她每周要在生态园买 5 斤有机蔬菜，肉食品则全部在这儿购买。长期的往来，让田波对罗宇很放心。“现在我們都很珍惜已经建立起来的信任，这样很好，生产、消费双方都很安心。”她说。

在罗宇看来，减少中间环节，是城乡互助型农业给破解食品安全问题带来的另一个启示。“食品安全问题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产品销售中间环节太多。比如，前段时间虽然有些品种的蔬菜价格涨得很高，但是种植的农民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利益，全被中间环节吃掉了。这样，农产品的种植者只有通过量大价低的方式来赚钱，结果为了追求产量滥施化肥、农药，甚至使用违禁添加剂等。城乡互助型农业省去了中间环节，就能让生产者获得更多利润，从另一个侧面促进绿色生产。”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乡村建设中心主任温铁军，是“小毛驴市民农园”早期发起人之一，对城乡互助型农业破解食品安全问题寄予很多希望。据他介绍，在欧盟国家，60%的农场是由市民经营。他认为，市民广泛参与农业是都市农业、现代农业的一种方式，随着中国城乡统筹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市民加入到农业生产中。

助力再造绿色农业生产体系

城乡互助型农业，在为消费者提供安全食品的同时，对改变农民生产观念、生产方式，促进绿色农业生产体系再造也发挥着积极作用。

“生态农业与传统农业相比，投入成本高，经营风险大，城乡互助型模式通过消费者预付定金，把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联系起来，可以避免农业生产的风险和提高农业生产的收益。同时，消费者全程参与或监督生产，也可以对我们生产者形成制约。”王纪伟说。

在“菜农人家”的一处农田，种着豆角、黄瓜、莴笋、西红柿等。正在大棚里干活的乔师傅告诉记者：“老板特别看重食品安全，只让我用农家肥，不用化肥不打药。像这西红柿，要是用点药早就变红了，人家就让等着自然变红。”

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台鱼乡柴各庄村菜农于宝银，从 2008 年起开始试点种植绿色农产品，一些市民通过网络和电话向她订购。于宝银说，自己去年种的无公害玉米销到了台湾、广东等地，价格是一般玉米价格的两倍多。她现在就是按照城里人所提的要求种植：种子不用转基因的，不打农药和除草剂。城里人时不时会来地里看看，监督她的种植过程。

南马庄农民范博伟眼看着村合作社养的“快乐猪”变成了“致富猪”，今年开春就和其他 4 个村民合作投入 10 万元建了座小型养殖场，买了 60 多头当地黑猪崽。“去年一头猪最多的挣了 2000 多块，今年成本上涨，至少也能赚个千把块，喂的是自己种的玉米和地里的野菜，都是传统的养殖方法，不用买来的饲料。”范博伟说。

合作社内负责百亩生态蟹藕混养的蒋旭东告诉记者：“去年大雨导致莲藕减产，且养蟹经验不足，结果还是有七八万元的利润。现在看来，跟风用化肥、专用饲料来种养农产品的观念得改变了，还是有机的东西有销路。”他说，城里人买之前就先问你怎么种的，怎样养的，用什么养的，许多人不仅仔细还很专业，许多词他都没听过。

河北省农业产业协会副会长胡志斌表示，目前城乡互助型农业在全国还处于崭露头角的阶段，将来随着其发展，相信会对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发挥重要作用。而生产方式的转变，才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所在。

破解城乡互助型农业发展瓶颈

城乡互助型农业为市民获取安全食品增加了新选择，也为农民提高收入开辟了新途径，更为我国农业摆脱农药化肥依赖、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新探索。但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种农业生产新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发展瓶颈，亟待有关部门予以重视和支持。

产销双方建立信任最难

“小毛驴市民农园”成立于 2008 年 4 月，是北京市海淀区农林委员会与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的农业合作项目。这种“官方”背景让“小毛驴”的信任在消费者群体中已不成问题。但并不是每个农场都有这种“资本”。

城乡互助型农业的最大问题在于信任。“比如市民会怀疑农场的农民真的会花大力气种植有机蔬菜吗？他们能够在难料的天气变化中种出满足自己不同种类需求的蔬菜吗？”北京“菜农人家”负责人高红伟说，对于不切实际的期望和某些怀疑，需要双方交流沟通，建立更多的信任。

问题在于，如今许多消费者十分缺乏对蔬菜生长周期的认知。高红伟说：“比如农场在6月份的时候只能提供一些叶类的蔬菜，但有的消费者会说，这时候为什么不能送给我一些西红柿和黄瓜呢？”

因此，种植户、养殖户与消费者之间如何建立联系并签订合同、如何监督保证产品质量、如何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等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秦安臣认为，硬性要求农户每年或每周的供应量是不现实的，因为还原自然的生产方式受各种因素影响很大，不良天气造成的损失难以预料，需要城市居民的理解和体谅。

“会种地”的老把式不好找

河北省顺平县台鱼乡位于山区，由于气候原因，玉米的播种期早于平原地区。记者在村民于宝银的指引下看到，播种后没有施除草剂和化肥的玉米地里杂草丛生，几乎淹没了枯萎的玉米苗。年近70岁的于宝银用手不停地将杂草连根拔掉，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精力。

望着邻家长势喜人的玉米，于宝银无奈地告诉记者，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仅留下妇女和儿童在家耕种，除草都找不到人，现在已经影响了玉米的生长。

种地的人少了，而有有机农业种植经验的人更少。农家肥怎么用、怎么发酵，许多村民都不知道。高红伟说，现在真的很难找到一个农民“会”种菜，“我当初找人种菜，跟人家说，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也不用激素，他们直摇脑袋说“不会种”，说你这是说着玩呢”。

高红伟介绍，现在北京各农场的员工一部分是当地农民，另一部分像工厂招工那样，是从全国各地招聘的有耕作经验的农民。“最担心的就是人力成本问题。相对于一般种植而言，有机种植的人力成本更高，比如一般种植可以使用除草剂，而有机种植完全要靠人工除草。”

“小毛驴市民农园”发起人石嫣说，如今很多村庄只剩下了老年人，这是对农业最大的挑战，政府应对有志于从事农业的人才给予更多的支持。

价格过高，消费者难承受

一位多年从事生态养殖的农场主告诉记者，他曾在河北保定山区散养柴鸡，建围栏、买黑光灯、防疫等投入超过10万元。但是，从养鸡场买回的鸡仔连虫子都不会吃，而且抗病能力差，800只鸡陆续病死了400多只，存活下来的拿到市场上以每斤17元的价格出售，是普通饲养方式产鸡价格的3倍，消费者望而却步。

一般来讲，有机农产品产量都较低，成本较高。于宝银去年种植的红薯亩产量只有1500斤，而其他村民照常打药、施肥，每亩能产4000斤。“这就是绿色吗？怎么越种越少了？不挣钱反而赔钱！”家人对她不无埋怨。

于宝银说：“耕地早都板结了，如果不施化肥庄稼就不长。俺家的地是生态农业试验田，

要等3年才能摆脱对化肥的依赖，慢慢恢复地力，庄稼才能自然生长，这期间都是亏本的。所以要说服村民放弃眼前利益、从事绿色种植，难度非常大。”

于宝银建议，政府应在前3年对采用生态种植法的农民给予补贴，提高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同时，由于生态种植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与过去都有很大不同，相关部门还应对农民进行生态农业的技术培训，尤其应教会农民病虫害的生物防治方法。“只有尽量提高产量，降低价格，才能真正打开生态农产品的市场。”

河南省郑州市“守护家园绿色消费联盟”会员徐可非则建议，政府应对城乡互助型农业加以扶持，“普通蔬菜批发的运输车辆可以享受绿色通道优惠，但我们由于规模有限，经常是私家车自己去农场取菜，运输的成本相对要高出一截，这也直接导致了价格的上涨”。

消费合作组织身份尴尬

为了寻找食品安全消费的破解之道，越来越多的农产品消费者和生产者直接对接，参与到城乡互助型农业的模式中来，但消费合作组织的尴尬身份是其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隐忧。“守护家园绿色消费联盟”负责人姚卫华说：“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专门的法律可循，但对于类似消费者合作社而言，法律上没有相关规定，所以到现在我们的联盟还没有注册。”

由于缺乏法律保护，消费合作组织的组织形式、运作模式都面临困境，这也直接导致许多活动无法正常开展。姚卫华说：“成立之初，我们希望通过做一些宣传活动，吸收更多的人加入，也带动其他市民成立更多的消费合作组织，但由于没有法定身份，许多活动都不便开展。”

专家指出，城乡互助型农业实际上是消费与生产的直销模式，其核心是消费者预付定金支持农业，而生产者将安全农产品不经过流通中介直接提供给消费者，这是对传统农产品产销体系的再造。关键是，生产者与消费者能否有效对接。

姚卫华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组织和组织对接，一是有利于消费者内部协调，二是有利于消费者和生产者公平对话。但由于消费合作组织的不完善，本应由消费者发起的城乡互助型农业模式，目前却转变成了生产者主导并发起，这直接导致了对接难。

河南省兰考县南马庄村支书兼南马庄农民合作联社理事长张砚斌承认，目前消费者资源的拓展，主要还是依靠合作社内的熟人关系介绍。“消费者多而散，生产者比较集中，消费者寻找生产者合作比较容易，但生产者去寻求与众多消费者合作，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半月谈)

● 国是论衡

中国须防楼市崩盘

众所周知，如果你开始从擦鞋的男孩嘴里听到炒股经，就到了做空市场的时候了。但当北京“的哥”告诉你应该把毕生积蓄拿来买哪个楼盘时，你又该怎样做呢？

判断中国房地产市场——对冲基金投资者吉姆·夏诺斯(Jim Chanos)称其“比迪拜糟糕1000倍以上”——是否存在巨大泡沫，可能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不仅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住房建设，其他许多经济体的命运也依赖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需求，尤其是像巴西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大宗商品出口国。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住房建设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主力，假如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并且破裂，所造成的冲击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率跌至5%以下。中共政府认为，要把社会不安定因素和建设真正政治代表制的诉求维持在可控范围之内，经济年增长率必须维持7-8%以上。

假如看到自己新买的漂亮公寓和别墅因中共驾驭经济不当、导致房地产市场出现大泡沫而严重贬值，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也许就不会那么甘愿接受一党专政。

那么，中国房地产市场究竟有没有泡沫？遍布全国各地的大批空置房和烂尾楼可作为泡沫之证据。可惜的是，我交谈过的最聪明的一些人意见并不一致。有些人说泡沫很大，有些人说根本不存在泡沫，还有些人说就算有泡沫，也绝对破不了。

有些人把泡沫定义为信贷迅速扩张、以助长从资产价格上涨中牟利的投机活动的现象，就此而言，中国房地产市场并不符合这种情况。

根据里昂证券(CLSA)的数据，2010年中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仅为45%左右，低于美国在1960年的55%，与2007年美国房地产泡沫高峰期的130%相比更是小巫见大巫。

但是，如果你把泡沫定义为资产的价格与基本价值存在根本性的错配，那么，中国房地产市场绝对符合这种定义。

在北京郊区毗邻首都机场的地方，分布着许多封闭式的别墅区，如棕榈滩、观唐、莱蒙湖、波旁宫。这些别墅区尽管名称堂皇，但就算是其中最顶尖的小区也与休斯顿或拉斯维加斯毫无特色的郊区无异。许多别墅建筑质量低劣，密度很高，屋后只有一小片黄土地作为院子，唯一的风景就是邻居家房子的侧面。

然而，北京一套像样别墅的现价在4000万元人民币（合600万美元）左右，足可在伦敦买一套不错的公寓，或者在曼哈顿买一套豪华公寓。

鉴于方圆数英里内的闲置农地上在建的类似楼盘有30个左右，让人很难相信这样的价格

能够维持下去。

北京的豪华别墅是极端例子，不能代表整个市场。然而，在中国各地的许多城市，平均房价与家庭平均年收入之比都达到了 10 倍以上。在发达经济体，房价收入比在 3 倍左右被认为是正常的。在其他亚洲经济体，这个比率大多维持在 5-7 倍。

看好中国楼市的人士认为，官方数据遗漏了“灰色收入”，因而极大地低估了居民的真实收入水平。所谓灰色收入，是指贿赂、回扣和逃税所得等没有体现在官方数据中的收入。根据一些估计，这部分收入可能相当于所报告收入水平的四分之一。

乐观主义者还认为，房价疯涨受到了政府拆迁补偿的推波助澜。中国各地城市都在大搞拆迁重建，政府为此向拆迁户提供补偿，使众多拆迁户得以购买市价远超其收入所能承受水平的新房。

北京等大城市充斥着大量月薪 2500 元人民币左右、身家却上百万的出租车司机和蓝领工人，就是因为他们从拆迁补偿中得到的住房价值节节攀升的缘故。

但是，即使是最乐观的“泡沫否认者”也承认，中国房价过高，从长远来看，当前价格水平是不可持续的。问题在于，考虑到房地产市场对中国、中共和全球经济的重要性，中国政府能否让房价逐步下降而又不导致泡沫轰然爆裂呢？（6 月 8 日英国《金融时报》[吉密欧](#)）

●财经频道

朱四倍：“白内障”现象下的省级财政透明度

5 月 30 日上午，《2011 年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排行榜》中的本年度调查显示，我国 31 个省级财政透明度平均得分为 27.63 分(100 分制)，与 2010 年基本持平，较 2009 年高出一点。新疆、河北、内蒙古三地的财政情况最透明，在 31 个省份中位列前三。但排名最后的 11 个省份信息公开度还不到 20%。（5 月 30 日《法制晚报》）

本则新闻中，至少有三处细节值得主义，一是在调查组搜寻的 113 项财政信息中，即使是提供最全面的新疆，仍然有 40 项信息无法获得；二是各单位的主页虽有华丽的外表，对关键信息却语焉不详；三是机关大楼建筑面积政府网站无从找到。如此种种恰恰印证了蒋洪教授所称的“白内障现象”：在检索相关信息时感觉就好像得了白内障，似乎看到了什么，但总也看不清。

但是，在中国香港、澳门，美国的纽约，日本的奈良、大阪，用同样的 113 个问题对他们的财政透明度进行评估，结果所有财政信息，在这些地区都可以很方便地获得。以日本大阪为例，对方的财政信息细致到难以想象——具体单位的领导人给别人赠礼品，赠给谁，赠了什么，哪天赠的，在哪赠的，这些都会一一列出来。对比之下，我们该如何看待“白内障”现象下的内地省级财政透明度平均得分不到 30 分呢？

可以说，内地省级财政透明度平均得分不到 30 分，几乎让所谓的财政预算公开几乎失去了应有的实质意义，充其量也是形式上的有限进步。我们知道，由于公共预算的收入和支出都与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必须公开透明。无论是权力机关的审查批准过程，还是批准后的预算执行情况都应当向社会公开，为全体公众所了解。但长期以来，在不少地方，政府如何花钱，花了多少钱，花到了什么地方，都被政府部门以国家秘密或者敏感信息的名义进行了遮掩。在这样的逻辑下，内地省级财政透明度平均得分不到 30 分值得奇怪吗？

从政府角度看，预算的公开乃是政府的道德与政治义务，不管法律对此如何规定，只要是负责任的政府就必然会公布公务花费，这就好像一个账房先生要把全部账目向老板公开一样，也只有这样才能说明，是政府在国民赋予的权限范围内，是设身处地代表民众的利益。而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表明，官僚们倾向于通过简化财政信息来掩盖低效的行政行为，如果不公开当前的财政支出和未来的政策后果，很容易让人们产生财政幻觉，对大量的财政浪费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理性对待内地省级财政透明度平均得分不到 30 分背后的“白内障”现象。

公众知晓预算就是知晓政府，预算公开透明就是政府公开透明，进而控制预算，也就控制了政府。但是，当你看到内地省级财政透明度平均得分不到 30 分时，就可以明白，隐藏其中的官意和民意之间的差距。早在数百年前，西方学者就曾梦想着把政府变成“玻璃缸里的金鱼”。假如政府行政能如金鱼一样清澈透明，让缸外人——公众看得见、看得清，将是社会之福。但是，从内地省级财政透明度平均得分不到 30 分来看，很难达到这种目的。

因此，应明确，公共预算不仅仅是政府资源配置的简单技术工具，更是作为现代社会中建立一个责任政府的关键所在。预算改革的目的是要把看不见的政府变为看得见的政府。只有看得见，人民才有可能对它进行监督。在这个意义上，内地省级财政透明度平均得分不到 30 分是一个怪胎，需要着力改变之。（中青网）

● 百科名片

食品安全 (food safety) 指食品无毒、无害, 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 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 食品安全是“食物中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公共卫生问题”。食品安全也是一门专门探讨在食品加工、存储、销售等过程中确保食品卫生及食用安全, 降低疾病隐患, 防范食物中毒的一个跨学科领域。